

物证与花语：广西党史百年历程的书画叙事研究

——以《物件述史 花草传情》主题创作为中心

吴善贞，刘丹青

广西艺术学院，南宁

摘要 | 本文以广西艺术学院研究生师生科研创作项目《物件述史 花草传情》为研究个案，探讨在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如何运用“书画一体”的传统艺术形式对百年广西党史进行创新性视觉叙事。论文首先分析项目“以物证史、以花传情”的核心创作理念，阐述革命历史物件与广西本土象征性花卉在构建历史记忆与精神象征中的双重作用；其次辨析“以书入画”“画上题跋”等创作方法，讨论传统笔墨语言表现红色主题时的当代转化路径；最后从红色基因传承、公共文化服务、地域主题创作路径探索等角度，评估此类艺术实践的学术意义与社会效益。

关键词 | 广西党史；书画一体；视觉叙事；红色文化；地域符号

Copyright © 2026 by the author(s).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主题性美术创作是当代中国美术实践的重要形态。自延安时期以来，以革命历史与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的美术创作，始终承担着记录时代、塑造精神、传播价值的文化使命。新中国成立至今，以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为主题的美术创作经过近八十年的演进，已逐步形成自身的绘画叙事语言体系。进入新时代，红色主题美术创作更被赋予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革命精神、服务公共文化的多重期待。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围绕如何以新时代艺术语言讲好百年红色故事展开讨论，建议创新创作新时代红色经典作品，借鉴先进展览方式与传播方法，增强红色经典美术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但在长期实践中，红色主题美术也面临若干值得反思的问题：部分作品在叙事模式上趋于同质化，以大场面、多人物的宏大叙事为主导，虽具史诗气势，却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观众的情感体验；一些作品偏重主题的思想性传达而忽视艺术语言的个性化表达，导致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失衡。若过度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西艺术学院研究生师生科研创作项目《物件述史 花草传情——中共广西党组织百年历程书画创作》的研究成果（编号：YKC202609）。

作者简介：吴善贞，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广西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书法系主任；刘丹青，广西艺术学院2025级书法研究生。

文章引用：吴善贞，刘丹青. 物证与花语：广西党史百年历程的书画叙事研究——以《物件述史 花草传情》主题创作为中心[J]. 现代艺术与传播, 2026, 1(4): 108-113.

<https://doi.org/10.68070/rz5m7z23>

突出思想性而忽视艺术性，作品容易沦为缺乏生气的说教物。如何在坚持正确政治导向的前提下拓展表现视角、丰富艺术语言，成为当代美术创作者和研究者共同面对的课题。

在此背景下，挖掘地域文化符号对于丰富红色叙事的价值日益凸显。广西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梧州早期党组织活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过桂北的足迹，以及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共同构成了具有广西特色的红色文化遗产^[1]。近年来，广西先后启动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文明史诗重大题材项目及建党百年主题创作工程，取得显著成就，但受资源分布广、数量多等因素制约，尚未形成充分体现区域特色的创作体系。如何将本土植物花卉、革命历史物件等地域符号有效融入红色主题创作，使其成为叙事的有机构成而非简单点缀，仍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物件述史 花草传情》项目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产生的。该项目以广西艺术学院研究生师生为创作主体，尝试以“书画一体”的传统艺术形式对广西百年党史历程进行创新性视觉叙事，核心创意在于将革命历史物件与广西本土象征性花卉组合创作，并以书法题跋点明主题、深化内涵，构建“物、花、书、画”四位一体的创作模式。这一探索既回应了红色主题创作如何“接地气”“有温度”的时代命题，也为传统书画语言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具体案例。

1.2 文献综述

围绕红色题材美术创作，学界已积累一定研究成果，大致可从三个层面梳理。

在宏观理论层面，研究者比较关注红色题材美术的当代价值与审美建构。吴为山指出，红色题材美术应以美为体、以史为魂，经典作品具有原创性、历史性、艺术性、文献性等多重特征^[2]。牛耕田认为，红色题材创作不仅是对民族历史记忆的铭刻与唤醒，更需立足当代视角对历史予以重新审视，其难点在于民族精神的塑造与革命精神的当代传承。周杨则从图像叙事角度提出，新时代红色美术可从典型叙事、现实叙事、意象叙事、象征叙事四个维度推进美学建构，其中象征叙事包含形式象征、借物言志、符号隐喻三个层次，并将草鞋、军帽等革命物件纳入红色精神的象征符号体系^[3]。这些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多聚焦宏观叙事与人物表现，对静物象征、微观叙事的关注相对不足。

在地域研究层面，广西红色题材美术的专门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冯凤举梳理了广西红色资源的分布格局：以百色为中心的左右江流域、以桂林为中心的湘江漓江流域、以凭祥为中心的中越边境线，

指出广西早年创作多集中于百色地区，近年部分画家开始尝试虚化背景、以厚重墨色营造氛围，将人文关怀融入创作^[4]。白杨则以党史题材作品为例，归纳出“时空交织的多线叙事”“单一时空的开源叙事”“跨越时空的综合叙事”三种叙事形态，为理解广西主题性美术的叙事语言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分析框架^[5]。梁冬华等学者对《八桂百年征程图》的评析^[6]，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广西红色美术的创作现状。但整体来看，现有研究多为作品评述和现象梳理，对具体创作方法论的深入提炼还比较少。

在书画语言转化层面，“以书入画”“画上题跋”作为中国画核心传统，在理论阐释已相对完善，但将其引入红色主题创作的研究仍较少见，对传统笔墨如何与红色主题精神内涵有机融合，具体案例的实证分析比较少。综上，现有的研究在红色美术宏观理论、广西地域创作现状等方面成果较多，但在地域符号的提炼、书画一体当代转化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本课题正是针对上述不足展开的。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物件述史 花草传情》项目及其规划创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该项目由广西艺术学院研究生师生团队承担，旨在通过中国画形式，以革命历史物件与广西本土花卉的组合图像结合书法题跋，呈现中共广西地方组织自1925年梧州建党至新时代的百年奋斗历程。研究主要采用三种方法：一是文献研究法，梳理项目资料并查阅广西地方党史、主题性美术创作及中国书画理论文献；二是图像学分析法，参照潘诺夫斯基图像学三层框架——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图像学解释，对代表性作品进行逐层解读；三是案例研究法，将项目作为完整艺术实践案例，从题材选择、形式语言、创作方法等维度考察其探索，评估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提炼可借鉴的方法论启示。

2 “物”与“花”：构建历史与精神的双重叙事

2.1 以物证史：革命物件的图像学意义

历史物件是沉默的见证者。一杆步枪、一盏马灯、一双草鞋、一封书信，这些寻常物件因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在场”，被赋予了超越物质形态的历史重量。在传统红色主题美术创作中，人物往往是叙事主体，物件多作为背景道具处于边缘位置。《物件述史 花草传情》项目的创新之处，恰恰在于将物件提升为叙事主角，让沉默的见证者成为历史的“诉说者”。

项目选取的物件可分为三类：其一为战斗装

备，如步枪、军号、大刀等，直接关联百色起义、湘江战役、左右江根据地斗争等武装斗争场景，创作中着重刻画枪托磨损、军号铜面黯淡等岁月印记，传递超越具体事件的历史厚重感；其二为生产生活用具，如草鞋、马灯、斗笠、水壶等，对应革命者行军跋涉、深夜议事、风雨坚守的日常维度，以朴素面貌将宏大叙事拉回到“人”的尺度；其三为革命文献，如书信、旗帜、文件等，承载明确历史信息，在艺术处理上常通过书法题跋与画面形成呼应，以文字与图像共同完成叙事。这种“以物证史”的路径体现了“以小见大”的叙事智慧，不追求全景式再现，而是通过局部、具体、可触的物件引导观众以想象补全历史情境，使观众不仅“看”到历史，更能“触摸”到历史。

2.2 以花传情：本土植物的象征性表达

如果说革命物件锚定的是历史的“真实”，那么花卉提供的则是精神的“象征”。项目的另一核心创意，在于将广西地域性植物赋予革命精神的象征意义，实现情感与志向的视觉化转译。

项目构建了以“红”为基调、以“坚韧”为内核的本土花卉象征体系。红棉又称英雄树，花红艳似火、树干挺拔，是广西极具辨识度的地域符号，象征革命者的铮铮铁骨与革命理想的炽热不灭。红杜鹃在广西山区广泛分布，春季漫山红遍，与“星火燎原”意象相关联，喻指革命火种在八桂大地的传播与燃烧。红荷取“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象征革命者在艰难环境中坚守信仰的精神品格，荷之红与革命之红形成语义双关。此外，劲松翠竹作为中国画传统中坚贞不屈的经典意象，也被纳入体系，表达革命精神万古长青的价值指向。这种“借物喻志”的手法在中国艺术传统中源远流长，以自然物象寄托人格理想始终是核心表达方式。项目将这一传统引入红色主题创作，将抽象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审美意象，花卉不是历史的装饰，而是精神的化身。

2.3 代表性作品的图像学解读

项目最具创造性的环节在于物与花的组合。以下运用潘诺夫斯基图像学三层框架，选取《步枪旁斜出红棉》《马灯照亮红荷》《草鞋趟过杜鹃丛》三件代表性作品进行逐层解读。

《步枪旁斜出红棉》：在前图像志层面，一杆步枪斜置于画面下方，枪管向上延伸，一枝红棉从步枪旁斜出，花朵红艳、枝干苍劲，两者形成器物与植物的并置关系，步枪构成视觉基底，红棉以向上姿态形成视觉动势。在图像志层面，步枪是武装斗争、牺牲奉献的约定俗成符号，红棉即英雄树，在广西地域文化中象征尊严与不屈，二者并置使步

枪的刚与红棉的烈相互强化，共同指向革命武装斗争的正义性与革命者的英雄气概；红棉从步枪旁斜出的构图更形成从枪管中生长出精神之花的隐喻——暴力所捍卫的，恰恰是美好的价值。在图像学层面，这件作品的深层内涵在于对革命与美关系的哲学思考：步枪代表手段，红棉代表目的，革命的暴力性与生命的美好性在此达成辩证统一，提示观众革命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守护与创造。

《马灯照亮红荷》：在前图像志层面，一盏马灯置于画面一侧，灯罩透出暖黄色光晕，一株红荷在灯光照射下呈现明暗对比，花瓣舒展、荷叶亭亭，两者以光为媒介建立视觉联系，画面整体氛围静谧温暖。在图像志层面，马灯在革命叙事中是暗夜光明的象征，关联深夜会议、秘密联络、思索抉择等历史场景；红荷是高洁人格的经典意象，隐喻信仰与品格追求。马灯之光照亮红荷之洁，暗示革命理想对人格的塑造与升华；灯是人造之物，荷是自然之物，二者并置构成人工与天然的对话，隐喻革命信仰既源于历史的自觉选择，也合乎人性对高尚品格的自然向往。在图像学层面，这件作品的深层意涵指向革命信仰的人格化基础：革命理想并非外在于人的强制规范，而是对人内在善性的唤醒与升华，马灯的光不仅照亮了荷花，也照亮了革命者的内心世界。

《草鞋趟过杜鹃丛》同样遵循这一组合逻辑：草鞋象征艰苦与坚持，杜鹃象征生机与希望，草鞋踏过杜鹃丛既是空间关系也是时间隐喻——革命者从艰难中走来，走向的是漫山遍野的希望。三件作品共同表明，创作者通过意象的自由组合打破物理时空限制，构建了历史记忆与精神象征交融的第三空间，产生了物因花而有精神高度、花因物而有历史厚度的审美增值。

3 “书”与“画”：传统笔墨语言的当代转化

3.1 以书入画：笔法意趣的融合与创新

如果说“物”与“花”解决的是“画什么”的问题，那么“书”与“画”的结合解决的则是“怎么画”的问题。项目在形式语言层面的核心探索，在于将“书画一体”的传统艺术理念引入红色主题创作，实现传统笔墨语言的当代转化。

“以书入画”是中国画核心理念之一。自元代赵孟頫提出“书画同源”以来，书法用笔与绘画造型的融合便成为中国画发展的主线，当代学者吕哲在梳理中国画发展史时指出，元代以后文人画家将书法用笔用墨的趣味应用于绘画，“以书入画”标志着中国画笔墨语言进入成熟发展阶段^[7]。这里

的“以书入画”并非简单将书法字形写入画面，而是将书法的笔法逻辑——起笔行笔收笔的节奏感、中锋侧锋逆锋的丰富性、线条的质感与力度——融入绘画造型语言之中。

项目在“以书入画”方面的探索，具体体现为不同书体笔法的差异化应用。器物轮廓采用篆书的“圆劲中锋”，篆书以中锋用笔为核心，线条圆润匀净、内含筋骨，用以勾勒步枪枪管、马灯骨架、军号弧线等，追求沉静、厚重、不事张扬的力量感，与革命物件沉默内敛的历史身份高度契合。花卉枝干采用隶书的方峻涩进，隶书以方笔为主，讲究蚕头雁尾，用以表现红棉苍劲老干、松树虬曲之枝，追求历经沧桑的质感与顽强生命力的表达。叶脉花瓣则采用行草的奔放流转，行草书运笔流畅迅疾、节奏变化丰富，用以刻画杜鹃层叠花瓣、荷叶舒展姿态，突出鲜活蓬勃的动态美，与器物部分沉静的篆隶笔法形成节奏对比。这种以书入画的实践使绘画造型超越了“像”的再现层面，成为“写”的表达，每一笔既是物象的塑造，也是书写者心性的流露，避免了作品沦为机械的图像复制。

3.2 画上题跋：文本与图像的互文共生

如果说“以书入画”是笔法层面的融合，那么“画上题跋”处理的则是文本与图像的关系。题跋是中国画独特的艺术形式，自宋代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以来，诗书画三者关系日益密切，发展到元代渐成风气，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程式。

项目将题跋作为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附加点缀，题跋在创作中承担三重功能：其一为点题，对于以物件为主题的画面，题跋书写与该物件相关的革命故事或历史背景，使观众在“看”物件的同时“读”到背后的故事；其二为阐发，对于以花卉为主题的画面，题跋以咏物诗句或自撰跋语将花卉的象征意义以文字方式加以确认和深化；其三为深化，在物与花组合的画面中，题跋以综合性表达将物与花、历史与精神的关系加以升华，使画面从“图”的层面上升到“思”的层面。在书体选择上，项目注重书体与画风的协调，工细风格配以楷书或行楷，写意风格配以行书或草书，追求诗书画印相得益彰的传统境界。

需要指出的是，在红色主题创作中引入传统题跋并非简单的形式挪用，其深层意义在于激活了“图文互文”这一中国艺术的核心传统，使之服务于红色文化表达。文字与图像之间形成互相阐释、互相深化的关系——图像为文字提供可视的依托，文字为图像提供可思的深度，观众在看画与读字的交替中既获得审美愉悦，也获得认知满足。

4 价值与影响：从艺术创作到文化传播

4.1 学术价值：探索主题创作的新路径

《物件述史 花草传情》项目虽在创作体量上无法与大型主题美术创作工程相比，但其在方法论层面的探索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创新。

其一，“红色主题+地域符号”的题材创新。项目将红色主题创作与广西地域文化符号的挖掘紧密结合，既避免了红色主题创作中常见的同质化、去地域化倾向，又为广西地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提供了艺术化表达路径。红棉、杜鹃、红荷等本土花卉的象征性运用，使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辨识度，也使革命精神获得了“在地化”的表达。其二，“静物叙事+象征隐喻”的叙事创新。项目突破了以人物叙事和宏大场面为主导的模式，转而以革命物件为叙事主体、以花卉为精神象征，通过物与花的组合构建叙事，这种“以小见大”“以物见史”的策略为红色主题创作提供了一种更安静、更内敛却同样有力量的方式。业界在讨论红色美术象征叙事时指出，借物言志与符号隐喻是新时代红色美术深化精神内涵的重要路径^[3]，本项目的实践恰好为这一理论判断提供了具体的创作个案。其三，“以书入画+画上题跋”的语言创新，将中国传统书画的核心方法论系统引入红色主题创作，使传统笔墨语言在表现当代红色主题时获得新的生命力，这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对传统的激活与转化。

三个方面的创新共同构成了项目的方法论贡献，为红色主题美术创作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学术思路：不是简单地用传统画红色主题，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艺术语言内在逻辑的基础上，使之与红色主题的精神内涵产生有机融合。

4.2 社会效益：红色文化的艺术化传播

艺术作品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更是文化传播的载体。项目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助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作为长征途经的重要区域正在推进相关建设，项目作品可用于公园陈列展示，以视觉艺术方式讲述长征过桂北的历史故事。2026年6月启幕的“史诗征程 精神丰碑——广西主题美术书法作品展”，即集中展出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雕塑创作项目的作品，其中多件出自广西艺术学院师生之手，是红色文化传承与艺术教育创作融合的直接例证^[8]。第二，举办基层巡展，服务公共文化。项目预期在广西区内举办基层巡展，将作品送到革命老区、学校和社区，使红色文化传播突破美术馆围墙，直接触达基层群众。第三，让党史故事活起来。项目以有温度、有情感的视觉语言，通过物件的实物感、花卉的美感和题跋

的文字感的多重叠加，构建立体化的党史叙事方式，使观众在观看中不仅“知道”历史，更“感受”历史。

5 结论

通过对《物件述史 花草传情》项目的系统分析，本文探索了一种红色主题美术创作的新可能。在叙事层面，项目以“物”证史、以“花”传情，通过革命历史物件与广西本土象征性花卉的组合，构建了静物叙事与象征隐喻相结合的独特模式。潘诺夫斯基图像学三层框架的运用表明，从形式构成到约定俗成的符号意义，再到深层文化内涵，物与花的组合在每一层面都生成了丰富的审美增值。在语言层面，项目沿着书画共生的思路，根据不同物象气质匹配对应书体笔法，再搭配书法题跋补足表意层次，将传统“诗书画印”相辅相成的审美范式自然转化为适配当代红色主题的表达语言。在价值层面，这一系列从地域符号挖掘、微观叙事构建到传统笔墨转译的完整探索，不仅为红色主题美术创作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路径，其公共展示与文化服务的落地方向也使学术探索真正对接了地方文化建设的实际需求。

综上所述，《物件述史 花草传情》项目通过“物、花、书、画”四位一体的创作模式，为广西百年党史历程提供了一种富有学术深度、艺术高度和时代温度的视觉诠释。它不是对已有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艺术语言和地域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展望未来，根植于地域文化、深耕于传统笔墨的主题性创作具

有广阔前景，如何在主题性创作中更好地激活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拓展艺术语言边界，仍值得美术工作者持续探索。

参考文献

- [1] 黎冰颖. 广西红色文化主题的中国画创作与研究生教学相结合的模式研究[J]. 美术界, 2023(12): 92-93.
- [2] 吴为山. 绘就时代画卷——谈红色题材美术作品创作[N]. 中国政协, 2021(14): 76-77.
- [3] 周杨. 新时代红色题材美术创作的图像叙事与审美建构[J]. 艺术教育, 2024(4): 203-206.
- [4] 冯凤举. 广西红色题材美术创作的当代性思考[J]. 当代广西, 2022(10): 64-65.
- [5] 白杨. 广西主题性美术创作叙事语言的建构与价值——以党史题材美术创作为例[J]. 广西社会科学, 2026(3): 165-172.
- [6] 梁冬华. 笔墨丹青绘党史 峥嵘岁月正风华——评中国画百米长卷《八桂百年征程图》[J]. 当代广西, 2022(16): 63.
- [7] 吕哲. 以文入画与以书入画——浅析中国画的两个特征[J]. 美术教育研究, 2012(2): 43-44.
- [8] “史诗征程 精神丰碑——广西主题美术书法作品展”相关报道[EB/OL]. 新华网, 2026-06-26. <http://www.gx.xinhua.org/20260626/27d2993bea4c4dc1aa4eab3bd49277bb/c.html>

Objects as Evidence and Flowers as Expression: A Study of the Calligraphy-Painting Narrative of Guangxi's Centennial Party History

——Centering on the Thematic Creation "Objects Telling History, Flowers Conveying Emotions"

Wu Shanzhen, Liu Danqing

Guangxi Arts University, Nanning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 and creative project “Objects Telling History, Flowers Conveying Emotions” of Guangxi Arts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how the traditional art form of “integration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an be applied to create innovative visual narratives of the centennial Party history in Guangxi in contemporary thematic art creation.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project's core creative concept of “using objects to witness history and flowers to convey emotions”, elaborating the dual rol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objects and Guangxi's native symbolic flowers in constructing historical memory and spiritual symbolism. It then examines the creative methods of “integrating calligraphy into painting” and “writing inscriptions on paintings”, discussing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brush-and-ink language in expressing red themes. Finally, it evaluates 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social benefits of such artistic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heriting the red gene, serving public culture, and exploring regional thematic creation paths.

Keywords: Guangxi Party history; integration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visual narrative; red culture; regional symbols